

性情—中国文化的原点

霍韬晦

（原刊《法灯》401期，2015年11月1日）

性情学原是中国传统最正宗的学问，虽然历史上一直没有这个名称。

性情学实际上是中国人生活中最常用的道理，虽然百姓日用而不知。

有没有这个名称，和知不知道它的作用，并不重要。中国人从来没有把性情作为一种知识来研究，一种可供抽象讨论的内容来分析。因为它就在你的生命中、你的生活中、你的思想中、你的行动中，自然而然，不须质询，一念透入，你就会发现它的存在。若加提问，反而不知所措。

我们已被改造

为什么？自从西方文化入侵，我们学会用理性提问题。西方文化的确开阔了我们的视野，也改变了我们的思维。谈现实问题，不论政治、经济、军事、法律、教育、科学、技术、社会活动……全用西方模式，连谈人生、谈学问、谈历史、谈未来，也以西方为圭臬。我们熟悉的那一套，早在一百年前反传统、反专制的时候反掉了。现在我们的思考、我们的行为、我们的处事方式、我们的工作习惯、也完全西化了，唯西方马首是瞻。所以谈政治一定是民主，社会一定是自由，经济一定是市场，管治一定是法律，个人一定是权利……我们已经被彻底改造，走不出西方的天罗地网。他们生，我们附之而生；他们死，我们也跟着死。

我们好像是不会思想的孩子，那里像有五千年文明的古国？很悲哀，也很可怜，我们不但失去了国势，也失掉了话语权，好像只有他们才有学问，我们什么也没有。

中国文化早熟吗？

中国文化为什么走到这一步？也许，这是历史的运命，文明和国势一样，会盛极而衰。梁漱溟说中国文化早熟，从尧舜禅让，开启政治文化、礼乐并张，而不以暴力，的确有其慧识。但何以三代之后，掉头向下，礼崩乐坏呢？这显然尚有所不及。孔子力挽狂澜，指出拨乱反正之道在开发自己内心之仁，这也就是我所说的性情，以坚定自己、承担大任，力抗歪风；然后以六艺课诸生，笔削《春秋》，建立纲纪，以成理想于未来，非常宏大，但毕竟时不我与，终其身不能见用于世。孔子曾经说过：「如有用我者，吾其为东周乎？」（《论语》〈阳货〉）可见其抱负，但终于不能见用，则诚如颜渊所说，是「有国者之丑」（《史记》〈孔子世家〉）。由此可知，历史的发展，并非尽为理性，有时反为私欲所害。

孔子之后，各国争霸，法家以其冷睿之思，教人君如何运用权力，帮助秦始皇统一了中国。表面看是立了大功，但其实只知权力、只问效果、草菅百姓、刻薄严苛，可说全无性情，但却一直影响着历代帝皇执政。

尽管汉武帝罢黜百家，独尊儒术，但法家阴魂一直不散，所谓「王霸杂用」（汉宣帝语）。直到明亡，黄宗羲写《明夷待访录》，痛定思痛，才直斥后人君之自私：「以天下之利尽归于己，以天下之害尽归于人。」又说：如此之君，岂能望臣子为之尽忠？则王朝之灭，良有以也。

不过黄宗羲虽痛责国君失德，更由此而思及整个体制之失效，但始终未能提出改弦易辙的方法。直至西方民主东来，国人才彻底向帝制告别。

在这一段时间，中国学术界经历了汉、宋之争，考据与义理的相轻，今文经学与古文经学的轮替，中学与西学的纠缠，最后以中国传统学问全线崩溃，几乎被逐出历史舞台作结。

中国文化被连根拔起

若问为什么会走到这一步？中国文化的命运真的那么凄惨，要承受灭门之祸？数百年来自卑之不足，还要自尽吗？古城被夷为平地，新建的一定是洋房吗？体制已变，格局已改，许多人都痛惜中国文化被连根拔起，但根在何处？我们还认识自己的根吗？

政治上的德治、经济上的均平、社会上的信义、生活上的礼乐、教育上的成己成人，这些中国先贤揭橥的理念有哪一点落后了？它们合起来，就是一个完整的体系，充实而有光辉，可惜被西方强调竞争的功利主义、自由主义、现实主义、个人主义毁了。

竞争是以个体的利益为核心的，为了使竞争合法化，西方使用了「人权」这个概念，并制作了一大堆法律来做护卫，美其名为「公正」，但究竟如何公正？只要看看美国这个极端资本社会贫富如何悬殊就知道了。中国近年追随西方的经济发展之路，小心别掉进深渊。

当代社会人的危机

现在整个西方社会出现经济危机，社会危机，再下去一定是政治危机。为了争资源，社会一定分化，分离主义会愈来愈有吸引力。这些危机的背后其实就是文化危机，几百年的自我解放、崇拜物欲、崇拜科技，早已令自己失控。西方人杀死自己的上帝在先（这一点尼采已指出），下一步就会杀死自己。

这样的文化我们还要追随吗？他们已步入疯狂，迷失方向，我们还要亦步亦趋吗？

这是人的危机、生命存在的危机，人无方向、人无理想、人无意义。可以说，自有人类历史以来，从未如此虚无过。人即使制造出大量产品，供自己享受，但欲望安顿不了、野心安顿不了，精神还是掉在虚空里。

在毁灭之前，人类是否能及时回头？那就必须对人类文化作大反省，几百年，乃至几千年所走过的路作总批判。有了觉醒，然后下一代才有希望。

中西教育的不同

人的问题，必须从人自身解决。一切向外寻求的，都是第二义。慎乎始，方向错了，走下去便会万劫不复。中国古人对此认识深切，一切教育的用心都是对向此一源头。所以说诚意、正心、正己、正念，格致非向外求知，而是吾心通向外物时如何得其正、得其真、得其道。讲到底是修养问题，而不是知识问题。朱熹以之外用，心外求理，便错了。中国人不是不关心知识，而是更重视求知时的态度。意诚，才不会以私意宰割万物；心正，才不会被欲望牵扯。

在这里，就要分辨念之正邪、意之善恶、心之诚伪、理之公私。在现实世界，这些东西具有相对性，但在人心起动，却有先后、本末。何者为先，何者为末？便有生命本体或所谓存有论的问题。近代学者受西方分析哲学影响，以为不值得讨论，其实是逃避了人生最严肃的一面。存而不论的结果就是错过，人变得无根。

检讨西方文化的是与非，是本世纪的大问题，当然不是我这篇短文所能尽，但因为问题已迫在眉睫：至少，我们拿什么去教育下一代？当眼见下一代的脆弱、放纵、自私、封闭、自以为是、无气无力的时候，你难道没有危机感吗？没有忧虑吗？人类辛辛苦苦建立的文明，对此束手无策，怎么办？当年作《易》者看到「臣弑其君，子弑其父，非一朝一夕之故」（《坤文言》），所以才有一种「为万世开太平」的设计。亦正如孔子作《春秋》，公羊家说他是为未来理想世界设置制度。

作《易》者是不是文王？孔子是不是真有这种改制之论？我认为都不是重点。重要的是他们的悲愿和心愿，在危机之前挺身而出，承担世运。在这里一定有个更深沉的、更根源性的力量在他们的生命里。平时无声无臭，但到非常之日，有所需要的时候就会跃然而出。

性情的力量

这是什么？我认为就是性情。一切不忍、慷慨、仗义、无私、奉献的行动就会出。历史之感人，不在理论，而在见证。唯有践道的人、殉道的人才能呼唤群众，带动历史，度过难关、走向光明。

性情不是生理意义的、心理意义的，也不是社会意义的，而是我们存在的根基。不过，你不要把它看做西方存有论思维上的本体，它不是一种概念结构，用来满足理性上的思考。对它的存在，你必须采取感受——体会的进路，由「格」以至于不隔，即亲觐，才能证入。若以对待知识的态度，先怀疑，后归纳，便会终身交臂失之。所以我说：性情的存在虽然如此真实，但一般人对之还是似懂非懂，似悟非悟，一片模糊。所谓「百姓日用而不知」，智者也很容易略过。

希望我这篇短文，能打开一个信道，帮助读者认识性情——中国文化的原点。